

本书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新闻出版总署新中国60年百种重点图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专题史稿



主 编 郭德宏 王海光 韩 钢

本书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新闻出版总署新中国60年百种重点图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专题史稿

V
世纪新篇
SHIJI XINPIAN
1990-2009

修订本

主 编 郭德宏 王海光 韩 钢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5, 世纪新篇/郭德宏, 王海光, 韩钢
主编. 2 版.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 1(2009. 8 重印)
ISBN 978-7-220-06676-4

I. 中… II. ①郭…②王…③韩… III. 中国—现代史—研究
—1949~ IV. K270.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1166 号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ZHUANTI SHIGAO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五)

——世纪新篇(1990—2009)

郭德宏 王海光 韩 钢 主编

策 划	解 伟
责任编辑	周 颖 叶 勇 唐海涛
封面设计	邹小工
技术设计	杨 潮
责任校对	叶 勇
责任印制	祝 健 李 进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成都槐树街2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 @ mail. sc. cninfo. 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86259459 86259455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259524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40
插 页	3
字 数	675 千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220-06676-4
定 价	298.00 元(全五卷)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86259624

目 录

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	武国友 (1)
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徐棣华 武 力 (18)
宏观调控决策和经济“软着陆”的实现	武 力 (39)
国有企业改革的新举措及其进展	朱文强 武 力 (56)
90 年代的中国内政与外交	章百家 (74)
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和实施	崔禄春 (90)
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汤应武 (118)
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确立	龙平平 (127)
“一国两制”构想与香港、澳门的回归	王红续 (139)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和实施	杨秋宝 (160)
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	曹 普 (183)
90 年代以来的执政党建设	高新民 (200)
迈向新世纪的军队建设	于化民 (223)
“三步走”战略的提出和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实现	吕书正 (247)
跨世纪发展战略的制定与中国现代化前景	吕书正 (272)
新时期海峡两岸统一进程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	郭建平 (299)
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	张明军 (326)
新时期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	钱 镇 (351)
新时期反贫困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杨秋宝 (364)
新时期教育体制的改革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曹 普 (385)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	肖冬连 (408)
中共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曹 普 (450)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郑有贵 (484)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提出与实施	石建国 (501)
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沈传亮 (518)
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	陈亚杰 (531)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与沿革	王海光 (548)
新中国宗教政策的历史演进	陈金龙 (584)
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历史演变	胡 岩 (610)
 后 记	 (633)
修订版后记	(635)

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

武国友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这两个事件为标志，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的历史跨入了改革开放的新阶段。

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社会形势

1992年初，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处于一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

首先，就国际形势而言，世界进入8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正呈现一种迅猛发展的态势；就我国周边的形势而言，当时我国在经济上正面临着来自周边国家的新的挑战 and 压力，对此我们如何才能做到处变不惊，稳步地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也迫切地需要作出抉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的发展仍较快，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的发展势头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后起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几年来的发展也很快，其中有的在发展速度上也超过了我国。所有这些，都使中国领导人感受到一种强大的压力。

其次，在当时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有些思想认识比较片面的人面对国际风云变幻和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的影响，不能科学客观地认识形势，一度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产生疑虑，并且提出一些不正确的主张，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他们或者出于对马克思主义某些论点的教条式理解和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认识，或者停留在那些不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不正确思想上，总认为只有坚持那种传统而又僵化的社会主义实践

模式，才算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搞市场经济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认为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在深圳等地创办经济特区，在城市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都是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用姓“资”姓“社”的大帽子压人，以阻止新的改革开放措施的出台。他们甚至企图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冲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些都涉及要不要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不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大问题。显然，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的事业就不能顺利地前进。

第三，我国经过三年治理整顿，已使 1984 年至 1988 年经济加速发展期出现的若干问题得到解决，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出现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有利条件。这是不可错过的良好时机。同时，也应看到，此时的经济生活中，仍然存在着一些深层次问题需要在新的发展阶段加以解决。前三年虽然基本上解决了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和经济秩序紊乱等诸多问题，但是部分国有企业效益低、亏损严重的问题仍有继续扩大的趋势。这主要是缘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没能进一步取得突破性进展，旧的经营机制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影响着经济效益的提高。在前三年的治理整顿中，国家的财政困难和赤字增加的问题，也没有解决。这是财力分配、财政支出的结构不合理造成的。总之，治理整顿结束后经济生活面临的问题，仍需进一步深化改革来得到正确处理。

不仅如此，就国内的改革形势而言，在 1984 年到 1990 年的深化改革中，政企状况仍有许多地方不尽如人意：1984 年后一直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第一线的企业，虽然经过 6 年的奋力拼搏已有所改变，但到 90 年代初有些竟出乎意料地显现出停滞甚至倒退现象。

“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的现象又开始抬头。职工的工资晋级，基本上是人人有份，无论是一线、二线还是三线职工，看不出收入上的差别。至于所谓的“新产品开发奖”、“合理化建议奖”、“科技进步奖”等名目繁多的奖项，几乎等于徒有虚名，能兑现的微乎其微。出力流汗的人与散漫懒惰的人之间看不出有什么奖惩上的区别。

至于企业负责人对其所领导的企业应承担的责任也已成了纸上谈兵。由于多层次的干扰，制约了企业领导人积极性的发挥，更使他们难以对企业生产和用人进行合理安排。压在头上的“婆婆”们经常指手画脚，出点难题，对正常的企业运作进行不正常的干扰，使得企业的领导人无所适从。

企业内部厂长与党委书记的职责不明，有的虽然明确了，照章办事的却为

数寥寥。一个“核心”，一个“中心”，谁说了都算，谁说了都不算。在老百姓中间不时传出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话题：厂长因对书记不满，提出开除党委书记的厂籍；而党委书记则提出，你要开除我的厂籍，我先开除你的党籍。多数情况下，为了保证政治上不出问题，厂长往往迁就于党委书记，“中心”服从“核心”的现象在企业中普遍存在。即使这样，企业经理们也常常有被随时撤换的担忧，因为他们的任免权被企业主管部门收回。于是出现了“短期效应”，企业没有长远发展规划，即使有了也是束之高阁。至于趁在任期间赶快大捞一把的负责人更是大有人在。

劳动合同制的实行因人而异，以至于出现在同期招收的员工中，有一些人受劳动合同制的限制，成为合同工，而另一些人却成为企业的正式职工。这一问题的出现反映出了人们深层次的认识问题，这就是习惯了端“铁饭碗”，对劳动合同制有惧怕心理，没有竞争意识，甚至害怕竞争，认为端不上“铁饭碗”就没有稳定的收入，也就没有稳定的生活。再加上有些企业在实行劳动合同制后，一些规定的优惠政策没有落实，合同制工人的工资性补贴被扣发，这就进一步增加了人们对劳动合同制的惧怕心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一些领导干部和劳动部门的工作人员习惯于少干事、怕麻烦，对过去那种由国家统包统配的劳动用工制度和管理体制抱着不忍割舍的留恋心态。

还有一种现象确实令人困惑，在精简机构、治理整顿之后，竟出现了企业机构再度膨胀、国有企业机关化现象。按规定，工业企业行政后勤人员和辅助工作人员占企业职工人数的比例不得超过15%，但事实上，相当多的企业仅脱产管理人员就已经超过30%。

据有关资料显示，抚顺一家化工企业的中层干部，由3年前的64人增加到3年后的124人。四川省的某地区有4家国有企业，共设科室70个，平均每个企业达17.5个。沈阳一家大型机械厂，通过精简机构后有26个处室，而到90年代初却又增加到49个。

机构的再度膨胀导致了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矛盾、扯皮事件增多。对此，企业的经理有苦难言，因为上面每设一个部门，这个部门就想在企业插一脚。而企业为了应付上级部门，也不得不设立相应机构，以免增加许多随时可能出现的非难与干扰。这真可谓是不得已而为之。而行政部门并不体谅企业的苦衷，反而对企业新增部门加以干涉，从人数到级别，甚至奖金的多少都有具体规定。企业的自主权在此几乎丧失殆尽。

这些问题的出现减弱了三年治理整顿的成效。1991年，质量、品种、效益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企业亏损面继续扩大，积压产品大大超过了库存容量，国家财政收入益显困难。企业的出路究竟何在？不少人发出这样的疑问。

与此同时，已销声匿迹多年的“平调风”也在集体经济中重现往日“风采”。在北京召开的集体企业深化改革问题研讨会上，15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无不忧虑地指出：平调风造成了城镇集体经济发展速度 and 经济效益的大滑坡。有关资料表明：江西、河北、四川、河南、甘肃、山西、贵州等省不同程度地存在平调风。太原市借行业整顿之由，划走集体企业40个，平调资产31811.14万元，每年还非法收取集体企业费100多万元。甘肃省轻工联社系统中效益比较好的74家企业，均被行政部门以行业归口为由无偿划走，总资产达2800万元。

中国城镇集体经济的资产来源有三种类型：一是50年代合作社经济发展起来的老企业，由个人入股、联社投入和集体积累而来；二是70年代后期为解决城镇青年待业而创办的集体企业，由安置费、扶持资金、贷款和企业集体积累而来；三是改革开放以来新技术开发区和沿海开放区的民办集体企业，资产由社会集资和个人出资而来。而一些行政部门根本无视宪法有关“保护集体经济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手段侵占或破坏集体资产”的规定，将集体企业的资产无偿收归“国有”，不能不影响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

由于平调风的影响和其他因素的干扰，1990年全国城镇集体工业增长速度不到8%，同期增长速度乡镇企业为12.5%，私营企业为21.6%，三资企业为56%。供应商业的增长速度为3.2%，而城镇集体商业则下降了5%。自1989年以后，停产、半停产的企业主要是城镇集体企业。据统计，上海半数以上的集体企业面临停产半停产局面，重庆市停工待业的企业中有三分之二属集体企业。

产生平调风的根源，主要在于“私利”作怪。一些主管企业的行政部门受私利驱使，打着“收归国有”的招牌，将一些赢利企业全部无偿地划走，或者强占一些具有生产经营优势的骨干企业，甚至鲸吞集体资金。结果得利的是某些个人，而非国家。

与平调风同时刮起来的，是乡村的“公社风”。一些乡镇以壮大集体经济为名，将已经承包给农民的土地收回；还有的是借调整地块，大幅度提高土地承包费用；更有的乡镇以赎买方式，把农户的资产收归集体。这种种做法使农民

产生了疑惑，都有一种要“变天”的感觉，纷纷议论：是不是党的政策又要变了？是不是又要回到人民公社去了？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主要内容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88岁高龄的邓小平在家人和有关人员的陪同下，1992年1月17日从北京起程，自1月18日至2月21日，历时35天，行程6000公里。一路上，他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回到北京后，他又视察了首钢。在视察过程中，他针对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了极为重要的谈话，明确回答了近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谈话的深刻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一）要认清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二）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邓小平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在这短短的几十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①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371页。

邓小平之所以强调要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是因为这条基本路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这一基本理论的总路线。这条基本路线客观地反映了我国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00 年间所要解决的主要社会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既是我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手段。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基本原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我们的任务，是要发展其互相适应的方面，解决其互相矛盾的方面，这就需要改革，开放也是一种改革，是在对外关系方面的改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应该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其意义也就在于它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又符合我国的客观实际。对于这一点，邓小平作了这样的估计，他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①

（三）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提出在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前提下，大胆地进行试验

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1 页。

针对一段时间以来姓“社”姓“资”的诘难和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的现状，邓小平提出“判断的主要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就经济特区和深圳的建设成就来看，“特区姓‘社’不姓‘资’”。邓小平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

对那些起劲地鼓吹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人，他批评说：有的人认为，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大问姓“社”姓“资”所反对的一个主要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们把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资本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和平演变阴谋硬拉在一起，从而造成了新的思想混乱和政治禁区。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以深刻的政治智慧和巨大的理论勇气，冲破禁区，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解决了困惑中国多年的难题，给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强调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关键是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邓小平强调要抓住时机尽可能地发展经济。他说：抓住机会，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

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

为了使经济能稳步地发展，他提出了台阶式的发展战略，进而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观点。他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发展。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他在上海参观时，还不无遗憾地检讨了自己的“一个大失误”，说：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他还提出，发展经济不但要抓住机遇，而且还要依靠科技和教育。再次强调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他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

（五）要求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

邓小平强调，“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只要我们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

（六）提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

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

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要注意培养人，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资本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邓小平强调，学马列要精，要管用。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七) 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去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邓小平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以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哪有这回事！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不过，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党中央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决策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犹如一股春风，很快就传遍了全国。恰逢春节，它成了人们拜年时最热门的话题，人们怀着很大的兴趣，互相传看着传抄的不同“版本”。这表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道出了人们的共同心声。

1992年2月28日，春节刚过，中共中央迅速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以中共中

央 1992 年 2 号文件的名义，正式向全党下发和传达，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全面深刻地领会谈话的精神实质，紧密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1992 年 3 月 9 日至 10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率先认真学习讨论了邓小平的谈话，一致同意邓小平谈话的观点，决定用南方谈话的观点统一全党的认识。会议根据南方谈话的精神，就改革开放的一些重大问题作出部署，并发表了会议公报。

会议强调，必须牢牢把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会议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要善于运用这些手段，加快商品经济的发展。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传达之后，立即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和巨大震动。在国内，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学习、宣传、贯彻、落实的热气腾腾的景象。全国的报刊舆论和理论宣传部门，纷纷发表文章、召开座谈会、举办研讨班，学习和宣传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精神。全国各级党政部门、各团体、学校和企事业单位，都根据南方谈话精神，调整或制定新的计划，并以实际行动加快了改革和建设的步伐。与国内的情况相对应，海外舆论也做了大量报道和评论，对邓小平的谈话予以高度评价。

许多同志指出，学习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一次解放思想的再讨论，基本路线的再教育，改革开放的再动员，加快建设的再推进。这一概括表达了人们的共同心声。正是在南方谈话精神鼓舞下，全党、全国人民振奋起来，全国形势出现了举世瞩目的生机勃勃的崭新局面。

1992 年 3 月 2 日，李鹏在国务院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抓住时机，加快改革。他说，要进一步发展经济，推动社会进步，离不开深化改革，扩大开放。3 月 9 日至 1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讨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会议指出，要按照邓小平关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自 3 月的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后，在 3 月至 5 月间，中央政治局常委又多次召开全体会议，研究和制定落实南方谈话的方案。

1992 年 5 月，中央制定了《关于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力争经济更好更快

地上一个新台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作为中央4号文件下发。《意见》提出了一系列加快改革、扩大开放的新举措。在加快改革方面,提出了转换经营机制,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加快物资、商业体制改革,深化经营体制改革,积极扩大国外市场,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加快教育和科研体制改革步伐的要求。在扩大开放方面,提出了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逐步开放沿海城市,形成周边对外开放的格局。继续办好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加快内陆对外开放步伐,省会实行沿海开放政策,扩大开放领域,拓宽利用外资的形式。《意见》还提出要抓紧办好几件大事:加快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抓好水利、能源、交通、邮电、通信和原材料重点项目的建设,结合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等。《意见》最后强调,要搞好政府机构改革,提高宏观调控的能力。

1992年6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来到中央党校,向省部级毕业班的学员发表重要讲话。江泽民在讲话中强调,中央和地方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就是要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开手脚,大胆试验,排除各种干扰,抓住有利时机,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

针对新的经济体制的几种提法,为统一全党的认识和行动,江泽民遵照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在报告中提出了他“个人的看法”,即“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

1992年7月到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又连续下达了3个文件。第一个文件是《关于加强政法工作,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的意见》。《意见》提出主要从两个方面加强政法工作:一是充分发展政法部门在调节经济关系,改善改革开放的法制环境,保护投资者和敢于改革试验的人的合法权益等方面的职能作用,运用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大力促进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二是强化专政手段,保卫国家安全,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惩治腐败,扫除丑恶现象,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廉政建设,维护社会持续稳定。

第二个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的意见》。《意见》指出,要以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理论来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即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要抓住这个中心不放,运用多种宣传手段,采取多种宣传形式,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鼓劲,把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空气搞得浓浓的,把全党和全国

人民的注意力吸引到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意见》还具体规定了改进宣传思想工作的一些措施。

第三个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在改革和建设中的战斗力的意见》。《意见》强调要从严治党，搞好党的自身建设，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始终站在改革和建设的前列，充分发挥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意见》对提高党的战斗力作了八条规定：（1）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2）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大胆提拔优秀年轻干部。（3）适应经济建设和改革的要求，进一步搞好各级地方党委的建设。（4）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5）强化干部培训，全面提高干部素质。（6）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步伐。（7）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8）认真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切实改进领导作风。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以及中共中央下发的一系列文件、指示，极大地振奋和鼓舞了人们投身改革开放的热情和积极性。于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又形成了新的浪潮。

第一，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重点，进一步把企业推向市场。1992年2月19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体改委关于1992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指出重点要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有步骤地把企业推向市场。6月30日，国务院通过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9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认真贯彻执行《条例》的通知，并作出7项规定：（1）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企业改革，企业改革的关键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2）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各级党政部门不得要求企业设置对口机制，增加人员编制；（3）转换企业经营机制，重点是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要不折不扣地把经营自主权下放给企业；（4）企业要充分运用《条例》赋予的经营自主权，主动地进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进行竞争；（5）企业贯彻《条例》，要紧紧依靠广大群众；（6）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按照《条例》的规定和要求，尽快制定《条例》的实施办法；（7）各地党政部门要做好现行法规、规章和政策性文件的清理工作，凡与《条例》相抵触的，一律按《条例》规定办事。

中央通知强调指出，《条例》的制定和发布，是深化企业改革的大事。《条例》的发布为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